



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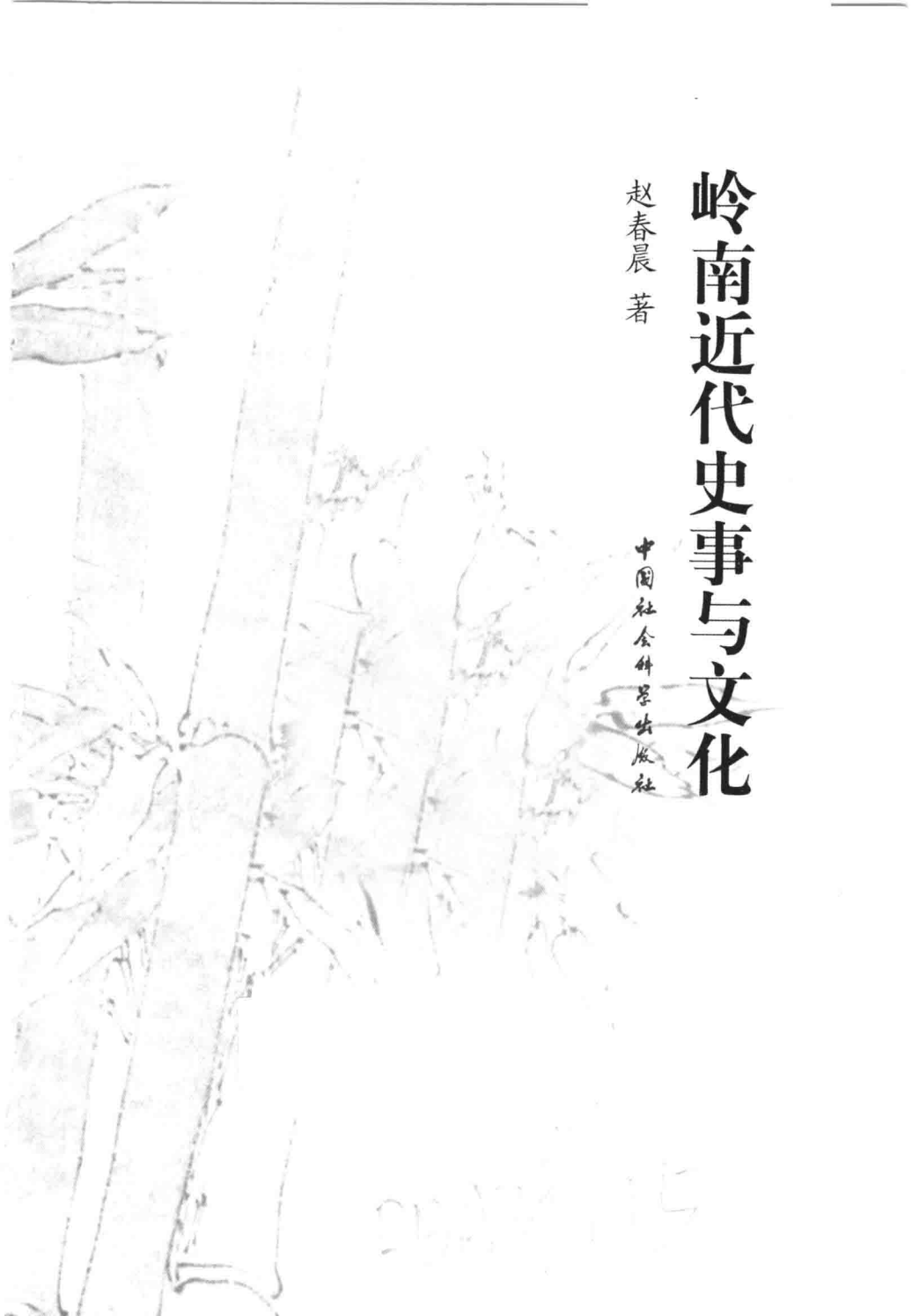
赵春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

赵春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赵春晨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0

ISBN 7-5004-4014-6

I. 岭… II. 赵… III. ①岭南—地方史—史料—近代
②岭南—文化史—史料—近代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872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特约编辑 王 卉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师若夫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375	插 页	2
字 数	432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收入本书的是我 1985 年到广东工作后陆续写作的有关岭南（主要是广东）历史与文化的论文。全书按论文的内容划分为史事篇、文化篇、视野篇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的论文都是围绕近代岭南地区的史事、人物和文化而展开的论述，第三部分论文则是针对近代中国一些全局性问题所作的透视与分析，这些问题与岭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书中的论文除少量是未曾发表的新作外，大部分都曾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公开发表，有的还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这次结集出版，除更正当初发表时的一些印刷错字和恢复当时受刊物字数限制而作的删节外，一般未作改动，以保持其原貌，同时也是为自己近年来所走过的学术道路留下一份原始的记录。

我祖籍河南商水，生于安徽，长于陕西西安，虽然在大学里读的是历史专业，研究生期间又师从邵循正先生治中国近代史，但在来广东工作之前，对岭南的历史与文化基本上是陌生的。由于南北语言交流上的障碍、生活习俗上的差异，初到广东时我甚至还闹过几次笑话。然而岭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朝气蓬勃的现实生活，很快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岭南文化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也使我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这里的文化与社会氛围。我逐渐适应了岭南的生活，并对岭南的历史文化产生出浓厚的兴趣，开始以其为对象展开研究工作，陆续撰写了一批论文和

著作。在这一过程中，我有幸得到在岭南工作的不少学术界前辈和师友们的鼓励、指导和支持，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和图书馆、博物馆的管理人员也热情地帮助我收集有关的资料，《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澳门《文化杂志》、《潮学研究》等刊物以及一些出版社和大学学报为我提供了及时发表研究成果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园地，广东省、广州市的社会科学规划部门、省市教育局和我先后工作过的汕头大学、广州师院、广州大学等，都曾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经费支持。正是由于这些来自各方的支持和帮助，我才能够以一个原本对岭南并不熟悉的北方人而获得本书的这些微薄成果。因此，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所有曾经支持和帮助我从事此项研究的人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关于本书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即“岭南”这一概念，通常是指位于五岭之南的现今我国五个行政省区（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所辖的地域，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的行政区划时有变动，“岭南”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到了近代之后，香港、澳门长期被英、葡所占据，广东、广西之间的差异也在逐渐加大，因此“岭南”的概念在人们的印象里已经不像古代那样宽泛，它时常被当做了广东的代名词（海南在整个近代都还是广东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末方才独立建省）。本书所论述的岭南史事与文化，除了几篇关于澳门以及国内全局性的文章外，主要是就广东这一地域而立言的。

关于本书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即“近代”这一概念，一般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00余年间的历史。但我认为，就整个世界历史而言，16、17世纪之后的中西关系已经开始具有近代的性质，因此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在岭南发生的一些中西关系的史事，当可列入本书的范围，有关早期澳门史的文章就是如此。

近代是岭南尤其是广东辉煌发展的时期。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将岭南近代历史的特征概括为五点，即：（一）社会剧烈动荡，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反侵略、反封建斗争连绵不断；（三）西方文化大量输入并与岭南文化相融合；（四）华侨对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贡献巨大；（五）岭南在全国的地位大大提高，影响力大为增强（见本书《略论岭南近现代历史特征与文化精神》一文）。总的来说，近代岭南由于当中西交往的首冲、得风气之先的缘故，加之有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等有利条件和岭南人锲而不舍的主观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一改古代岭南“蛮荒之地”的旧形象，而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它不仅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且多次成为国内政治运动的中心或策源地，文化上则兼容中西、求变求新，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并在全国发挥强大的辐射作用。岭南近代名人辈出，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巨人，其他可列入全国性的明星级人物更举不胜举，这是其在全国地位提高和影响力扩大的具体体现。正因为如此，岭南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极具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的意义，而本书所收入的论文，只能说是一些点滴性的论述，距离系统、全面的研究还相差甚远。即使就本书所论及的一些点滴而言，由于我的水平所限，也显得相当粗浅，无论是观点还是资料的利用都难免有错误与疏漏之处。这些都敬祈读者予以谅解，并给予批评指正。同时我也希望本书能在岭南历史文化的研究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能看到这一领域有更多更好的著作问世。

赵春晨

2003年1月29日序于广州大学

目 录

序.....	(1)
--------	-----

史 事 篇

论鸦片战争期间以岭南为中心的“借取”西洋武器浪潮	(3)
洋务运动在广东	(19)
张之洞与广东的近代化	(39)
容闳与丁日昌	(53)
丁日昌与晚清教案	(65)
丘逢甲与日本	(78)
丘逢甲己亥港澳行探论	(85)
许雪湫生平事迹考	(94)
孙中山与辛亥南北议和	(106)
论孙中山和平统一中国的主张与实践	(125)
汕头开埠与美国	(140)
汕头开埠史实考	(149)
澳门保皇总会史事钩沉	(166)

文 化 篇

略论岭南近现代历史特征与文化精神	(187)
略论近代潮汕文化的转型	(199)

从广东实学馆到黄埔水师学堂

——晚清广东的海防教育…………… (208)

爱国情怀与天朝观念

——试析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岭南知识界的

文化心态与社会舆论…………… (222)

梁廷枏的基督教观…………… (236)

论丁日昌与潮汕文化…………… (248)

从《海防条议》看丁日昌的洋务思想…………… (260)

丁日昌《揭阳新乐府》写作年代考…………… (271)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与基督教…………… (275)

论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创教”、“保教”主张…………… (294)

“胶变”与康有为…………… (313)

论孙中山的宗教信仰与文化取向…………… (324)

从《三民主义》演讲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 (338)

再论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 (346)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文化观念的更新…………… (360)

从《洪秀全演义》、《大马扁》两书看黄世仲的

政治思想…………… (375)

关于《澳门记略》乾隆原刊本的几个问题…………… (385)

视 野 篇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 (393)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辨析…………… (402)

太平天国与近代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412)

论太平天国对辛亥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 (429)

晚清洋务派与教案…………… (444)

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教案及义和团…………… (466)

再论维新派对教案的认识与态度…………… (487)

略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若干特点	(501)
论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 战争的态度	(518)
论甲午战后至辛丑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533)

史 事 篇

论鸦片战争期间以岭南为中心的 “借取”西洋武器浪潮

19 世纪 40 年代初，即鸦片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一段短暂时间里，岭南地区曾经一度出现购置、仿制西洋武器（包括火炮、船舰、枪支、火药、水雷等）的浪潮。为这一浪潮推波助澜的，不仅有与西方接触时间较长、对西方情况较为熟悉的岭南行商、士绅、中小官吏等，而且有奉派来粤主持军政事务的一些朝廷大员。这一浪潮还波及到了与岭南同处抗英战争前线的江浙、福建等地，甚至连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也在其影响下一度对仿制西方船炮表现出兴趣。然而这一购置、仿制西洋武器的浪潮，并未带来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的勃兴和西洋军事技术的大规模引进。相反，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这一浪潮迅速地消退了。近代国人购置、仿制西洋武器的初次尝试刚刚拉开帷幕即告夭折，其社会原因和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深思。

一、“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于西洋的武器状况虽然已经有所闻知，甚至有过初步的接触，但毕竟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1839 年 9 月，奉命来粤查禁鸦片的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写道：“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

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赏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①实可代表当时人们对于西方军力和装备的普遍认识。然而时隔不久，鸦片战争的残酷现实，使得身处军事前线的人们对西洋武器的威力开始有了切肤之痛。1841年1月，钦差大臣琦善在广东向道光帝奏称：“连日详查该夷进兵情形，向共知其仅专于水战，今诂料其并设有陆兵。计该夷水战之具，船只则大小悉备，火器则远近兼施，更有所谓飞炮者，子内藏放火药，所至炸裂焚烧，又有炮内尽属铁片，系于桅顶，高出炮台之上，能使射入台中，一经散放，约及数十丈广远，而台内台外，同时被焚。他如火枪火箭火罐火球之类，亦皆远且准，而为我师之所不及。且兵船非货船之比，吃水本浅，其小兵船火轮船，更不过数尺之水，即足以资浮送，行捷如飞，路径循熟，随处窜越。”^②同年10月，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前线奏称：“伏查自上年该边犯顺，迄今载余，所攻之处，无不摧破。前此定海之被陷，与粤省虎门之失守，尚由于失防。若厦门则有鉴于定海、虎门而防之甚密矣，乃一昼夜即已荡然。本年之定海、镇海，更有鉴于厦门而防之益密矣，乃旬日间仍复荡然。夫厦门、定海、镇海三处守御事宜，皆聚全省之精华，殚余年之心力，方能成就，实非易事，而该逆乃直如破竹。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③林则徐在与英人进行军事较量后也总结道：“剿夷而无船炮，是自取败也。……彼之大炮，远至十里内外，其接仗相隔远甚，并非覩面，况其放炮之法，与内地排枪同一接连不断。我仅小炮，既不能及彼，且放一炮后，须费多少辘

转，然后再放。若不于此求所以制敌之方，即远调万军，亦只仅临阵之一哄。”^④上述几人虽然在对外态度上不尽相同，但他们对西洋武器装备明显优于中国的感受却是相同的，相信这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侵略铁蹄所及之处人们最直观、普遍的一种感受。

基于这样一种“器不如人”的感受，一些有识之士和战事所在地的官员们把拥有、利用西洋武器看做是御敌的当务之急。他们虽然仍旧抱着传统的“华夷之辨”的观念，对来犯的英人充满鄙夷的心态，但又认为“借彼之矛，攻彼之盾”，乃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祖训。从这种“借取”奇器的心态出发，他们开始了购置、仿制西洋武器的活动。

林则徐是最早从事此项活动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来到岭南不久，即一改过去对西洋军力和武器装备的轻蔑态度，开始购置、仿制西洋武器。他在广州期间，曾经向道光皇帝奏称，为了防备英人来犯，自己“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⑤，又曾“检查旧籍，捐资仿造西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⑥。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也记述道：林则徐来粤后，“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于虎门之横档屿设铁链木筏，横亘中流。购西洋各国炮二百余位，增排两岸”，“并购旧洋船为式，使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⑦。当时在粤西人亲眼目睹了林则徐下令仿制的西式战船下水，曾记载道：“1840年4月25日，两三只双桅船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欧洲船式建造的，可能加入帝国海军了。”^⑧

林则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具有开风气的倡导作用，无论是在其督粤期间或是离粤之后，岭南地方上都有人继续致力于“借取”西洋武器的活动，其中较著名者有潘仕成、丁拱辰、潘世荣、梁汉鹏等人。

潘仕成，广东盐茶富商，番禺人，于1841年捐造战船一只，

“仿照夷船作法，木料板片极其坚实，船底全用铜片包裹，以防虫蛀”。据第二年驻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两广总督祁埏等向朝廷报告说，潘仕成捐造的这只战船经“调拨水师营弁兵驾驶，逐日演放大炮……炮手已臻娴熟，轰击甚为得力”。而且潘仕成“续又造成新船一只，照旧船加长，工料亦仍旧坚固”，另外还有两只同样式样的战船也在“督工赶办”之中^⑨。同时，潘仕成还向美国军官壬雷斯学习配制火药，制造水雷。奕山、祁埏等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向朝廷奏称：“本年六月间，绅士潘仕成独立报效，不惜重资，雇觅咪利坚国夷官壬雷斯，在僻静寺观配合火药，又能制造水雷。据该绅士声称：所制水雷一物，尤为精巧利用。奴才等曾派人在彼学习技艺，俟将来造成后，如果演试有效，该绅士自行派人赍送到京，听候阅验。”^⑩

丁拱辰，原系福建监生，早年曾赴澳门、南洋等地谋生，平日留心西洋炮术，鸦片战争期间到广州军营报效，“呈献象限仪一具，测量演炮高低之法”，并进呈《演炮图说》一书，介绍西人制炮演炮技术^⑪。清廷对其颇为重视，1843年初道光皇帝下令将《演炮图说》原本一册、重订本一册以及小铜炮、炮架式样四匣交两江总督耆英“悉心核酌，按式铸造”。耆英奏称：“臣当即躬率在省司道及印委文武各官谨敬祇领，详加核酌。内照旧式另换工料之炮架，利用于宽大平正炮台之上，又仿夷船内所用炮架，利安于船舱之中，又平底两层四轮中用磨盘心炮架，利用于船头及平原旷野，四面皆可埋伏轰击之处，均属合宜。……现在择定之式，各制一具，查照《演炮图说》，试演妥当，再行如式一律成造。并将《演炮图说》刊刻颁行各营，令明白文义之人，与各弁兵先行口讲指画，日夕讲解，俾知放炮之法，然后照式试演，以利军用。”^⑫丁拱辰还积极研究西洋火药、炮弹的制造和炮台建筑技术。他先后写成《西洋制火药法》、《西洋炮台图说》、《铸造洋炮图说》等书。他配制的火药，“其药力竟与洋药相等，

烟亦白色，见火即燃”^⑬。他吸收英国炮台的建筑技术，在广东设计了曲折形、圆形、润土式三种形式的炮台，以适应不同地形的防御需要。他还设计了一种旋转式的活动炮架，被广泛使用于广东各地炮台。

潘世荣，广东绅士，鸦片战争期间曾雇请外国工匠制成小火轮船一只。奕山、祁埏在 1842 年 11 月向朝廷奏报此事道：“至于火轮船式，曾于本年春间，有绅士潘世荣觅雇夷匠制造小船一只，放入内河，不甚灵便。缘该船必须机关灵巧，始可适用，内地匠役，往往不谙其法。闻澳门尚有夷匠，颇能制造。而夷人每造一火轮船，工价自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将来或雇觅夷匠，仿式制造，或购置夷人造成之船，由臣祁埏等随时酌量情形，奏明办理。”^⑭

梁汉鹏，番禺人，“善铸西洋枪炮，并合造西洋火药”。鸦片战争期间曾入粤督祁埏的幕府，“教标下将士以陶铸枪炮，合造火药之法”。据记载，他所制的枪支，“铅丸较英诘利火药所及加远。……以示夷人，夷人惊服焉”^⑮。

在鸦片战争后期，包括奕山、祁埏在内的一些广东军政大员们，也都对购置、仿造西洋武器表现出相当的热情。据奕山、祁埏和广东巡抚梁宝常等向朝廷奏报，他们自 1841 年秋天起，即“仿照外夷夹板作法，令绅士雇觅巧匠，作大小兵船三四只，以为式样”，到 1842 年春竣工，船只“放入内河，架炮试演，甚属可用”。同期，还由地方绅士报效及自购“夷炮大小九百余尊”^⑯。1842 年夏，有两艘美国兵船来到广州黄埔，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曾偕南赣镇总兵马殿甲、署督粮道西拉本登船参观，“逐细察看”，深为其优良性能所吸引，决定雇觅巧匠，仿照其样式“制造船样一只”。该年 10 月，奕山、祁埏、梁宝常、吴建勋就此事向朝廷奏称：“逆夷恃其船坚炮利，因我师船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是以肆行无忌。……此时如讲求最得力之船，必须

仿照夷船式样作法，庶堪与该夷对敌。”奕山等人提出：“查制造战船，既取其工坚料实，断不能吝惜重价，必须先造大号战船三十只，再造小号船三四十只……拟将粤东现届拆造年分例修师船暂停制造，以冀节省经费，为改造大船之用。”^⑩这个建议得到道光皇帝的赞许，道光下谕：“朕思防海事宜，总以造船制炮为要，各省修造战船，竟同具文，以致临时不能适用，深堪愤恨！此次所造各船，自不至拘守旧日式样，有名无实。据奏停造例修师船；改造战船。所办甚合朕意，均著照议办理。……所进图说各五件，著再缮就三分，咨交江苏、福建、浙江督抚。本日已有旨，谕令各就该省洋面情形，详加履勘，何者合用，奏请制造。”^⑪此后广东地方官员积极筹措经费、购备木料，“统由潘仕成一手经理”，准备大事仿造新式战船。同时，粤省大吏还“晓谕洋商，购买夷船”，到1842年底已有洋商伍秉鉴、潘正炜“捐买咪利坚、吕宋夷船各一只”，经祁埏等人查验，“木料坚实，尚堪应用，惟船只尚小，且已略旧”，因此又决定继续“督饬洋商，随时妥为察访购办”^⑫。此后，在1843年钦差大臣耆英来粤期间，也曾几次觅购“洋枪”和“洋火药”，并向道光皇帝进呈，请求进行仿造^⑬。

岭南所出现的这种“借取”西洋武器的活动，也影响到了同处抗英战争前线的江浙、福建等地。

在浙江，有嘉兴县县丞龚振麟“精于泰西算法，故制造军械，皆能覃思极巧”。他在参加浙东抗战过程中，目睹英军火轮船“以筒贮火，以轮击水，测沙线，探形势，为各船向导，出没波涛，维意所适”的先进性能，“心有所会，欲仿其制，而以人易火。遂鸠工制成小式，而试于湖，亦迅捷焉”。浙江巡抚刘韵珂闻知其事，“令依前式造巨舰”，龚振麟仿照西洋火轮船的样式，又参考了林则徐从广州带来的战船图样，造成一种中西结合的车轮战船，“驶海甚便”^⑭。龚振麟还根据林则徐、刘韵珂等人